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体系

第 二 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吕 丹 刘海龙 译
侯树栋 王 勇

庞卓恒 主译兼总审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 号

图字:01-1995-340 号

COPYRIGHT© 1980, BY ACADEMIC PRESS, INC.

中文版 © 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根据学术出版公司 1980 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V. 2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 Economy, 1600 - 17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
巩固/[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著;
庞卓恒等译.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

ISBN 7-04-006165-1

I. 现… II. ①沃…②庞… III. 经济-概况-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808 号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100009 传真:64014048 电话:64054588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80 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098—5 107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
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序言：十七世纪的危机？	1
第一章 B 阶段	12
第二章 荷兰在世界经济体中的霸权地位	44
第三章 中心区的斗争——第一阶段：1651—1689	95
第四章 缓慢增长时期的边缘区	169
第五章 十字路口的半边缘区	237
第六章 中心区的斗争——第二阶段：1689—1763	333
索引	401

序言：十七世纪的危机？

历史学家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价格趋势的研究¹，以弗朗索瓦·西米昂德(Francois Simiand)²提出经济周期理论(约250年经历一个上升和下降周期的趋势)和两阶段(A和B)的划分为指导，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似乎迄今还被广为接受的关于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总的概括，即16世纪为扩张阶段(A阶段)，17世纪为紧缩、萧条或“危机”阶段(B阶段)。虽然关于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出现的诸多变迁的性质(即使我们把讨论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地区间的差异，特别是变动的后果与原因，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这个总的概括却始终未变。

1953年，罗兰·莫斯尼尔(Roland Mousnier)写了一部论述这200年历史的巨著(该书自问世以来已出版了四个修订版)。在阐述17世纪——即被确定为1598年至1715年这段时间——这一部分时，他用一种戏剧性的颤音语调作为其开篇之词：

17世纪是一个危机时代，它从整体上影响着人，影响到人的一切活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的活动——以及人的整个存在，影响到人的生命力、情感和意志的最深处。这场危机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只不过伴随着强烈的上下波动。³

这部著作问世后的第二年，E.J. 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m)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曾掀起一场学术大争论的文章。该文认为“欧洲经济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即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转化的最后阶段”。⁴

类似的论点在威廉·埃贝尔(Wilhelm Abel)与B.H. 斯利彻

·范巴思(B. H. Slicher Van Bath)对欧洲农业的权威性研究中也以见到。在埃贝尔看来,“17世纪的后半期至18世纪的前半期,欧洲价格主要呈下降的趋势”。⁵的确,斯利彻·范巴思是不愿意用危机一词的,他认为165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是“一段不同寻常地被拉长了的萧条时期”,⁶但这是否就相差很大呢?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反对埃贝尔的观点,即这段时期反映了一个“周期性趋势的逆转”。⁷假如我们引用更为审慎的用语,我们就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学术观点的一致性。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提到了“17世纪的相对衰退”;⁸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则将A阶段和B阶段之间的差别解释成不是“增长[与]衰退的差别”,而是“增长[与]欠增长”的差别。⁹勒内·巴勒尔(René Baehrel)是最不情愿想像有全面危机的人;但连他也采纳了这一概念,运用于1690年至1730年这段十分明确地限定的时期。¹⁰随着术语的含义越来越淡化,表明危机的时间越来越缩短,我们不知还有多少实质内容保留下来。伊沃·舍弗尔(Ivo Schöffer)以一种疑虑的语调为他论述这一时期的一篇文章作开篇之词:

那被镶嵌于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17世纪,有时看起来像是没有独具一格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位于二者之间的世纪的情况仅仅是一些诸如“过渡”和“变迁”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术语。¹¹

正如让·默夫雷特(Jean Meuvret)在1944年指出的那样,或许这仅仅是因为对于两个价格明显上涨时段之间的这一时期,“我们所知太少”。¹²那么,我们是否就应拒绝阐明这一时期的特点,而听任这个时期陷入那些含糊不清、有时甚至连资料也混乱不堪的复杂状态中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同意舍弗尔所说:“这可能是传统主义妨碍我们作出更好的判断,但是我们确实应该给17世纪一

个应有的位置。我们的想像需要它”。¹³

要不是因为术语争论背后有着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决策当成是文学中流行的奇思妙想。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诸如经济的“长期趋势”那样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¹⁴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们与政治和文化是什么关系。假定这些长期趋势确实存在，那么每一对前后相继的阶段（中世纪至现在）是否都如加斯頓·英伯特（Gaston Imbert）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一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呢？¹⁵或者如斯利彻·范巴思所说的那样，它们都是从大约 1150 年延续到大约 1850 年的“间接的农业消耗”这一漫长时期的组成部分呢？¹⁶或者说在这当中的某处是否还存在着一次重大的断裂呢？如果存在一次重大的断裂，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它何时发生的另一个问题。

对最后这一问题，有几种常见的说法。一派认为根本性的突破，重大的断裂是随着 18 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而发生的。在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看来，这一“事件”与公元前 8000 年的农业革命都代表了“历史进程连续性中的深刻裂口”。¹⁷D.C. 科尔曼（D.C. Coleman）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 1500 年至 1750 年间的欧洲经济发展中，延续多于变化：“仔细观察，从总体看，1500 年至 1750 年的工业技术停滞多于变动”。¹⁸同样，在界定断裂的时间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得出了相同结论，如巴利巴尔（Balibar）坚持认为，1500 年至 1750 年是“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1750 年以后是资本主义确立时期。¹⁹与巴利巴尔持同样观点的 G.N. 克拉克（G.N. Clark）区分了中世纪晚期的“早期资本主义”和 19 世纪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并清楚地划分了“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至伯克（Burke）^[1]，从哥伦布（Columbus）至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2]，从福格尔家族

[1]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政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派政治家、政论家和演说家。——译者

[2] 哥伦布（1451—1506），原籍意大利的西班牙航海探险家通往美洲的新航路开辟者；沃伦·哈斯廷斯（1732—1818），英国殖民统治者，曾任英属印度总督等职。——译者

(Fuggers)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衰落^[1],从焦托(Giotto)至蒂耶波罗(Tiepolo)^[2]的第一阶段的界限。它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s),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3],拿破仑(Napoleon),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之时嘎然而止²⁰。”

另一思想流派认为,断裂包含的不是工业革命,而是在“延长的”16世纪左右出现的欧洲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的崛起。例如,西米昂德就把16世纪视为长波期的开端。²¹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则抨击巴利巴尔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工场盛行时期”(大约1500年至1750年)和“近代工业时期”不是“两种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的两个阶段”。²²因此,这种断裂就发生在16世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虽然更加扩展了这一时期,但仍得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

事实上,很明显,从一种经济观点来看,13世纪至17世纪大致构成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它在经济上向“旧制度”(Ancien Régime)提出了有力挑战。²³

第三种观点认为断裂点发生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延长的16世纪之间。他们把17世纪中叶视为近代的转折点。霍布斯鲍姆似乎持这种观点,皮埃尔·肖尼把这种观点作为其关于“古典欧洲”的真正的综合主题。在他著作的序论中,他特别反对那些

[1] 富格尔家族,14世纪中叶发迹于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后发展成为大金融、工商业家族,15—17世纪活跃于欧洲国际舞台,17世纪末破产;阿姆斯特丹港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曾是欧洲世界贸易的最大港口,18世纪后期趋于衰落。——译者

[2] 焦托(1266—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蒂耶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译者

[3] 罗斯柴尔德家族,活跃于18、19世纪欧洲国际舞台的犹太大金融家族。——译者

没能看到在斯宾诺莎 (Spinoza) 著作中已经可以见到“法国大革命的理性起源”的学者, 以及那些忘记了 16 世纪的“数量和空间的扩张”并非是一种真正深刻的变化, 而仅仅是“一场 12 世纪就开始的革命的最后结果”的学者们的观点。肖尼认为, “最重要的质变发生在 17 世纪”, 而首要的质变是“世界的数学化”。²⁴ 在每一问题的每一个方面, 人们皆可见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论证。例如, 这第三种可能的断裂点观点的倡导者, 就有一位是苏联院士 E.M. 茹可夫 (E.M. Zhukov)。他在 1960 年向聚集到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历史学家断言:

按照苏联历史科学界的观点, 中世纪一般的和终结的界限是 17 世纪中叶。这是因为封建制度那时在经济上已进入垂暮之年, 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²⁵

这样, 对一次断裂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年限, 即 1500 年左右, 1650 年和 1800 年; 三种 (或更多) 历史理论, 即: 主张 1800 年者, 强调把工业主义看成是一次剧变; 主张 1650 年者, 侧重强调第一批“资本主义”国家 (不列颠和尼德兰) 出现的时间, 或者强调笛卡尔 (Descartes)、莱布尼兹 (Leibnitz)、斯宾诺莎、牛顿以及洛克的主要的“近代”思想的出现; 主张 1500 年者, 侧重强调一个与其它经济模式相区别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对于“17 世纪是危机时期吗”的质疑的回答, 取决于人们对于近代世界的看法。危机一词不应被贬成一个周期性转变的单纯的同义词。它应被视为一个剧烈紧张的时期, 不仅是一次危机, 也标志着一个长时段 (Longue durée) 结构的转折点。

因此, 危机可以反映那些罕见的历史时刻, 那时社会制度内的通常的补充机制在许多重要的社会角色看来是如此的无效, 以致开始对经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建 (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内对利益的再分配), 这种经济的重建后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当

然一场既成的危机并非真的不可避免；但是替代的出路就是旧制度的瓦解，它会使许多（多数？）社会角色认为那种选择比已经发生过的结构的革命更具破坏性或更令人讨厌。如果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危机的含义，那么“17世纪是危机时期吗？”就成为—个颇具重要意义的学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指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化”是何时和怎样发生的？该问题的答案要求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文明。在我们对上述不同时期选择的同时，我们也就选择了相似与不相似的范围。

本书的论点是：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欧洲延长的16世纪^[1]便已产生了，它促进了一种特殊的再分配或纳贡式的生产方式，即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布罗代尔所说的经济上的旧制度）向一种性质极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转化。自那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a)从地域上已扩展到整个世界；(b)已经显示出一种扩张和紧缩的周期模式（即西米昂德的阶段A和阶段B），而且不断改变着经济角色的地理位置（霸权的兴衰，特殊的中心区、边缘区以及半边缘区的起伏动荡）；(c)已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化，无产阶级化，以及对这种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的政治抵制力量的出现——这种转化今天仍在继续。

从这种角度来看，如果把17世纪视为大体上覆盖着从1600年左右至1750年这一段时期，它首先就是一个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模式的范例。在世界体系包括的整个地域范围内，建立于1500年左右的若干疆界直到1750年以后才发生重大改变。就是正在进行着的长期变化过程，在1600年至1750年这段时间内也难以发现有任何显著的质的飞跃。因此，我们认为在延长的16世纪和17世

[1] 即本书第1卷第2章所引布罗代尔所言：“‘我们的’16世纪分成两个……第一个16世纪开始于约1450年，结束于约1550年，第二个16世纪开始于同一年代，而延续到1620年或1640年”。见中译本第1卷边码第68页。——译者

纪之间本质上存在着连续性,伴随着扩张(A)与紧缩(B)、增长与欠增长的重大差别。我们将如何为这种概述现实的方式提供证据呢?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将尽力辨别扩张与紧缩间可察验的差别,指出这种周期模式产生的原因,并且概括阶级结构、政治斗争以及经济命运转变中的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结果。从这种经验的描述中,我们将尽力把一个转为庞大的社会历史变迁理论中的一部分即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阐述得更为清楚。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的范围尽管在150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内大致一样,但是,1450年(或1500年)至1650年与1600年至1750年(这种时间上的重叠是人为的)这两段时期内,在资源配置、经济角色、富裕与贫困、雇佣就业的分布以及工业企业方面是有区别的。要证明这种观点并非易事;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需要若干种全新的系列的经济指标,从内涵上讲这是比较困难的,从外在形式来看,也许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需要以25年为一时段的、反映奢侈品和必需品贸易的规模、价值和趋向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同时态图表,以及1500—1650年和1600—1750年的“累积的”图表。如果我们的设想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图表就可以反映出主要从事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的欧洲贸易运转的地域范围:它处于东欧和俄罗斯、土耳其所辖的巴尔干之间,还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地中海地区;这些地域范围可能包括美洲,却不包括非洲和亚洲。

最重要的是,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图表除非把加勒比地区包括在内,就不会显示在1500—1650年与1650—1750年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外部地域范围的模式的重大差别。另一方面,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所包括的范围之内我们会发现某些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的重大变化。工业的分布与集中将是不同的(或者至少在变化的过程中),正如在工业与农业间的贸易,各地的雇佣就业的百分比以及雇佣工人的实际工资等方面会显示的那样。不同的国家机器可能变强或变弱,工农业生产 and

人口繁衍的增长率也可能发生变化。那些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变异,最为重要的是,每个地区所占有的世界剩余额的相对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即使在阐明那些预料中的变化趋向,提出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以前,读者也会明白所需要的定量资料是极其稀少的——至多不过是一些局部的和零散的数字。特别欠缺的是能够证明有关世界经济的相关性陈述的全面资料。如果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诸多变异做出肯定的论断,情况就会更糟。我们应该在1500—1650年与1600—1750年。这两段时期内,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整体而非特定国家的疆界内,发现一些阶级结构的变化模式和种族—国家疆域界说的变化,但这方面我们拥有的资料更为稀少。在这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分析零散的资料,对那些多少可信的材料加以概括,重新考察包含那些资料的解释性模式,提出一种理论上的见解,总结出一些我们经验上和理论上欠缺的概念。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去考察历史文献所指的17世纪的“危机”、“相对的倒退”或“欠增长”的内涵。

注释

1 参见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所著文章的目录(1967, pp. 605~615)。

2 参见西米昂德(1932b)。

3 莫斯尼尔(1967, p. 161)。

4 霍布斯鲍姆(1965, p. 5)。

5 埃贝尔(1973, p. 221)。埃贝尔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935年出版。第二版出版于1966年,经过修改并在内容上有所增加。埃贝尔说:“保留了总的框架”,但是“14—15世纪和16—17世纪的萧条时期被解释为衰退时期,并尽可能作了细分”(1973, p. 6)。埃贝尔认为两次萧条之间有一次回升。

6 斯利彻·范巴思(1963a, p. 206)。最近的两篇考察报告(奇波拉, 1974, p. 12; 戴维斯, 1973b, p. 108)都不愿意使用危机一词,虽然奇波拉补充说:“每一个简单概念的底蕴总有一点真理”。

7 这种说法出现在第五章第二部分的标题(埃贝尔, 1973, p. 206)。皮埃

尔·肖尼在一篇关于 17 世纪的文章的标题使用了相似的短语,“价格与活动主要趋势的逆转”(1962b)。

8 维拉尔(1974,p.46)。他认为这一时期开始于 1598—1630 年,结束于 1680—1725 年。

9 肖尼(1962b,p.224)。这与西米昂德对阶段 B 最初的描述相近:“并非阶段 A 的逆转,而是……一种微弱的增长或一种平衡,不再是继续增长”(1932b,p.649)。

10 巴勒尔(Baehrel)(1961,p.29),像肖尼一样,巴勒尔认为阶段 B 未就是一种衰落,而仅仅是一种缓慢的发展(1961,p.51)。其他人也认为这一时期特别艰难。勒·鲁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是“(17)世纪最后的 20 或 30 年”(1973,p.431)。雅卡特(Jacquart)认为是 1680 年至 1710 年(1978a,p.385)。但是,莫里诺(Morineau)发现了 1660 年至 1700 年间“大量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迹象”(1978f,p.523)。

11 舍弗尔(1966,p.82)。随着历史学家引人注目的活跃,许多模糊的概念总会遭到排斥。“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地被划分为‘过渡时期’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学家对变化的依恋。”(苏普莱[Supple],1959,p.135)

12 默夫雷特(Meuvret)(1944,p.110)。参见莫多·麦克劳德(Murdo MacLeod)有关西属中美洲(Spanish Central America)的论著开头所发出的类似抱怨:“不久前,17 世纪还被看作是‘拉丁美洲被人遗忘的世纪’”(1973,xi)——在提到雷斯利·鲍伊德·辛普森(Leslie Boyd Simpson)所著题为“墨西哥被人遗忘的世纪”的论著(1953)时,J.V.波利森斯基(J.V.Polisenský)以相同的语气说:“社会、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一直很关注‘更具革命性的’16 和 18 世纪,却极少顾及 17 世纪”(1971,p.2)。威廉·鲍斯马(William Bouwsma)“从一种历史观的角度”把 17 世纪称为“在两个过度发展区域之间的欠发达的边界区”(1970,p.1)。

13 舍弗尔(1966,p.83)

14 弗兰索瓦·克鲁泽(Francois Crouzet)在 1971 年时提到“像西米昂德的阶段 A、B 那样的陈旧概念”(1971,p.147)。这时来自左翼的吉勒斯·波斯泰尔—维奈(Gilles Postel-Vinay)发起了类似的攻击,他指出:“A 与 B 两阶段……证明是由于忽略地租分析引起的实际问题而必定要采取的方式”(1974,p.78)。

15 G. 英伯特(G.Imbert),在有关长波的论著中(1959),区别了四种长

期趋势,每一种趋势与一种经济形式相对应:

1250——中世纪经济

1507—1510——重商主义经济

1733—1743——资本主义经济

1896——计划经济

16 斯利彻·范巴思(1963a, Pt. III)。

17 奇波拉(1964, p. 31)。

18 科尔曼(Coleman)(1959, p. 506)。这是一篇评论《技术史》第三卷的文章,科尔曼把它作为其论点的证据。同时参见勒·鲁瓦·拉杜里(1977)就1300—1320年与1720—1730年间“静止的历史”的论述。

19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种时期分法。然而艾廷纳·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自觉地把“过渡时期”与一种生产方式盛行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了理论上的区分(1968, pp. 218~226)。

马克思主义者内部讨论这一分期问题的明朗化的争论,出现在1940—1941年的《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上。这场争论围绕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最早的一批关于英国革命的论著而展开。彼得·费尔德(Peter Field)指责希尔把1640年的英国看成“本质上还是封建的”。费尔德认为,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16世纪的英国“显然是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是正确的:16世纪的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确,与比利时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Belgium)相比,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显赫的资本家”(费尔德,1940a, p. 558)。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man)认为,费尔德“错把蛋当成鸡”,如果资产阶级革命在1640年以前就爆发了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是什么时候?”(加曼,1940, p. 652)。费尔德答复说,加曼先生“忘记胚胎和出生并不相同”,而且“以玫瑰战争(the War of Roses)为开端——资产阶级利用封建主的集体毁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进而)通过农民起义、没收教会地产、恩典朝圣(the Pilgrimage of Grace)(以及)北方伯爵的崛起,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产生”(费尔德,1940b, pp. 654~655)。

由此,多纳·托尔(Dona Torr)竭力为一种非常明确的阶段理论作辩护。她说,费尔德的错误在于认为社会从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因此“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小商品生产的中间阶段”。她说“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只是在14世纪英国庄园经济“解体”以后400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

生而得以存在(托尔,1941,p.90)。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在论述与多纳·托尔相同的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折衷态度。一方面,他不同意托尔把资本主义的时期定在工业革命的观点。他说,如果这么讲,“如何能把17世纪的斗争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难道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存在?”此外,他说,那种认为“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与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是要回避这一问题”。多布对此问题的解答是,这时“即使生产力还保持其中世纪的形态,生产关系(可以说已发生了变化)”。因此,应正确地把16世纪的英国看作其“生产方式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多布,1941,p.92)。尽管多布的观点避免了托尔的观点容易导致的陷阱,但是正如多布后来的著作所表明的,他的看法与托尔的观点并无根本的不同。

几年后,希尔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国革命的观点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是指“封建国家被其内部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所推翻,一个新的国家建立起来,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希尔列举了许多事例,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如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精神对旧秩序的第一次进攻”);尼德兰革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848年流产的德意志革命;以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1948,p.135)。这篇文章集中于政治表现和权力,回避了对经济的直接描述。因此,它没有能解决费尔德提出的问题。

20 G.N. 克拉克(G.N.Clark)(1960,pp.10~11)。

21 西米昂德(1932a,p.3)。

22 斯威齐(Sweezy)(1972a,p.129)。

23 布罗代尔(1974,p.6)。

24 肖尼(1966a,pp.20~21)。

25 茹可夫(Zhukov)(1960,p.85)。茹可夫特别注意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当作转折点,但是俄国人却不同意。

第一章 B 阶段

在斯利彻·范巴思看来,欧洲自加洛林时代(Carolingian era)以来,农业的膨胀与紧缩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谷物价格相对于其它商品和工资而出现的上涨和下跌。这是一个对谷物贸易条件有利或不利的问題。他看到从1600年(或1650年)至1750年这一时期内谷物的紧缩,因而存在不利的贸易条件。¹因为斯利彻·范巴思相信小麦价格的相对下跌远比其绝对下跌重要,因此,强调这种紧缩的内涵十分必要。²与贸易条件的变化并行的(暂时避开所有因果关系的设想)是K. 格拉曼(K. Glamann)所说的发生在1650年左右的“大宗的东、西方谷物贸易”中的转折点,其原因显然是“南欧和西欧(好像)对谷物已日益自足”。³自足的原因是“17世纪后半期的西欧在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人口的增长却普遍停滞”。⁴从而可能导致了供过于求。然而,格拉曼在这同时也发现“胡椒的供应已在欧洲达到饱和”。⁵

但当时似乎存在着食物短缺的问题,怎么会出现供过于求呢?舍弗尔认为“从14世纪的灾难直至18世纪”,存在于欧洲的“永久性的、有时是潜在的结构性的现象”首先是“粮食的生产和分配与人口的粮食需求之间持续的紧张”,结果造成“营养不良,饥饉流行”。⁶多梅尼科·塞拉(Domenico Sella)认为近代早期的富足依赖于“粮食的供应是否与人口的增长保持平衡”,而另一些人认为生产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显然,我们遇到了一种不规则现象,只有对事件的顺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作出解答。我们且首先看一看其它事件的发生情况。

17世纪农艺方面的某些变化如下:垦荒过程至少放慢了,可

能已停止了,还有可能倒退了。不同于 16 和 18 世纪的“创造土地”的时代(按肖尼巧妙的比喻),17 世纪,特别是在 1650 年以后,是一个“巩固”时期,但这种巩固却“毫无价值”。⁸ 不仅耕地面积不再扩大,在 1600 年至 1699 年这段时期谷物的平均产出率在整个欧洲下降了,大麦和燕麦比小麦和黑麦的下降幅度更大。中欧、北欧、东欧各地下降得比西欧更厉害。⁹ 德·马达伦纳(De Maddalena)称这种产出率的下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¹⁰ 农艺方面的另一个变化是对栽培作物的选择:首先,在较寒冷的地区将种植谷物的土地变为牧场,在较温暖地区则改种葡萄;¹¹ 其次,从种植谷物转向更多地生产饲料作物、需要密集劳动的蔬菜以及经济作物(亚麻、大麻、蛇麻草、油菜籽、茜草和大麦);¹² 其三,从高价的谷物(黑麦与小麦)转向低价的谷物(大麦、燕麦和荞麦),¹³ 并且减少购买生产谷物所需的肥料(腐殖土和石灰泥)。¹⁴

随着这些纯农艺上的变化,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也发生了诸多的转变。德·马达伦纳认为,17 世纪时,“农民阶级的处境普遍恶化”¹⁵,在这期间,“地主以‘目前的迫切需要’为借口继续没收以前属于农民的农田”。¹⁶ 他还注意到“对公有财产的 1/3 的剥夺——称之为劫掠可能更贴切——由此产生‘三开地’一词”。这就减少了农民有权放牧和采樵的地段。¹⁷ 斯利彻·范巴思也认为农村居民遭受了城镇居民远不能匹比的痛苦,但是他一方面区分了小农场主和茅屋农,另一方面也区分了雇工和家仆,前二者的处境比挣工资的后二者的境况“相对来说更为糟糕”。¹⁸ 默夫雷特对此作出了十分清楚的解释:

在那些因小麦的价格低而抱怨利润微薄的自耕农或佃农看来,众多的雇工或工匠都为价格低廉而感到欣慰;当他们必须购买小麦时,那样的良机是极为罕见的。¹⁹ 总的来看,斯利彻·范巴思认为自耕农和佃农(femiers - propriétaires)经济地位的恶化是与租佃地的减少,特别是与小租佃农场主